

中国伶人性别 文化研究

厉震林 ◆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伶人性别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厉震林 ◆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伶人性别文化研究/厉震林著. —北京 : 文化
艺术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39—5978—3

I. ①中… II. ①厉… III. ①戏剧家—性别—
文化研究—中国 ②剧作家—性别—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J8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2878 号

中国伶人性别文化研究

著 者 厉震林

责任编辑 胡 晋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978—3

定 价 36.00 元

序

余秋雨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厉震林先生成了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二十一世纪开始后的第三年，他就完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

今天，当他又一次把这篇论文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几乎忘了。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厉震林早已成为学院教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指导的不少博士生也都已成为一代学术骨干。于是，他，理所当然，成了“长輩学者厉教授”。他的这篇学位论文，也随之成了“两个世纪交接期的历史文本”。

时间过得真快。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也越来越抽象。照理，应该以衰朽残年的昏聩淡然一笑，诸事不问，岂料天道厚爱，使我还有体力、心力纵笔小谈。

我觉得，以“两个世纪交接期的历史文本”来回顾这篇论文，有点意思。

当年此文新出，令传统的戏剧理论界有点措手不及。原先戏剧理论中的一切重要范畴和概念完全不能来判断它，而中国戏剧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命题，也对它鞭长莫及。但是，它明明在讲戏剧理论，又明明取材于中国戏剧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一旁暗笑：一场世纪性的转换，也波及了这个领域。世纪性的转换是脱身，是放弃，是重新择路，是改变语法。

是的，是改变语法，而不是在已有语法下增添词汇。这“语法”，可称为戏剧人类学。

戏剧，一般只与观众发生关系，怎么扯得那么大，大到了人类？

其实，这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视角的根本转换。早在上一次世纪交替，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一些最优秀的学者发现，人类的充分进步和整体悲剧，使得各种条块分割式的研究失去了意义，而“人类的生存方式”成了“诸学之魂”。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心理学家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例如弗洛伊德、荣格。尤其是荣格，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文化人类学的奠基大师。

既然是“诸学之魂”，当然也不会让戏剧学逃过。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的戏剧学家还都以实践家为标志。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特别接近戏剧人类学的人，例如布莱希特。在布莱希特之后，阿尔托（Antonin Artaud）、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等欧美戏剧家，均对戏剧人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像布莱希特一样，这批人的努力还是集中在实践上，有点理论，却很疏淡。

这就是说，戏剧人类学在实践上已大师如林，在学术上还留下大量空白。这，当然是当代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一个丰饶之地。

在我看来，戏剧人类学具有独特的学术理由。这是因为，在艺术门类中，只有戏剧，是不同历史时期全社会各色人等自动聚集、自动买票、自动鼓掌、自动离场的一种“公共人群选择方式”。戏剧，历来不具有严格的观众选择机制，因此特别赋有“人类性”。即使只研究人类学，也不能放弃戏剧。“人类”的一切内外禀性，在剧场中体现得最为集中、最为充分。

厉震林先生所选的“中国伶人性别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戏剧人类学课题。对此，我想借一位著名戏剧家来加以说明。

我前面在讲到布莱希特的时候，人们也许会记起一度与他一起被列

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代表者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兰芳，这两位都是实践家。但是，对中国人熟悉的梅兰芳来说，他的巨大魅力，从起点上，一定与性别有关。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广大观众在面对梅兰芳艺术的同时，一定会探问自己兴趣的底层秘密：对性别转换、性别另立、性别交错、性别互叠的深深好奇。

这种深深好奇，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好奇。不仅在广度上超越国界，而且在深度上探及人类生存的悖论。悖论，是极其深刻又摆脱不掉的两元对立和双向涡旋。性别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记得很早以前读到已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写于一九五二年的名著《梅兰芳传稿》，发现其中最精彩的文笔都黏着于性别文化。可见，唐教授已经比较自觉地接受了文化人类学的启迪，把戏剧当作了他的研究典范。后来，我认识了他，便郑重地把拙著《中国戏剧史》寄给他，因为据白先勇先生评论，拙著是“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戏剧史的著作”。但是，我刚送去，唐教授就病了。我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他指派自己的妹妹到场聆听。不久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不胜唏嘘。

从梅兰芳到唐德刚，至少可以说明，厉震林的选题有点重要。

但是，作为学位论文，厉震林就不可能像唐德刚先生那样写得笔底潮涌，意兴纵横。作为十几年前的学位论文，也未免受到当时中国学术界过于着迷一些“概念硬块”的影响。如果现在来写，厉震林一定能够更多地从社会学转向人类学，从思路缕述转向实例解剖。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世纪之交先人一步，把握到了高层学术的前沿，提升了戏剧研究的境界，也提供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例，值得肯定和鼓励。

论文，让读者自己看吧，我年老眼花，不作细评了。只是随着论文产生一些想法，随兴漫谈。作为序言，似有不恰，敬祈读者诸君原谅。

2014年1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社会性别与性别角色	1
一、性别分析范畴	1
二、社会性别概念	2
三、文化构造的社会角色	4
第二节 伶人的特殊性别和角色	8
一、两性的较量关系	8
二、伶人性别角色的符码化	11
三、男权社会他者的女性伶人	12
四、女性伶人的“公共领域”男性化	18
第二章 伶人性别的权力话语和编排	30
第一节 权力的性别确证和占用	30
一、性别角色和权力话语	30
二、权力和性别的互动意义	39
第二节 权力的性别制衡和编排	59

一、权力的性别失控和抑制	59
二、权力的性别防备和转移	69
第三章 史学虚构和想象的伶人性别气质	83
第一节 男性伶人的虚构和印象	83
一、史学流露的男性气质	83
二、男性伶人的政治形态	96
第二节 女性伶人的想象和描述	116
一、公共领域的策反性	116
二、史学的形象“标识”	119
第三节 伶人性别的历史哲学	135
一、关系体制的“变量”	135
二、政治和演艺的公共领域	144
第四章 文士和伶人的性别面具人格	153
第一节 文士和伶人的性别唱和	153
一、男性文士的女体情愫	153
二、文士和伶人的性别交游	174
第二节 文士和伶人的性别面具	200
一、男性文士的二重人格	200
二、文士和伶人的性别压抑	227
后记	247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社会性别与性别角色

一、性别分析范畴

“将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 20 世纪末的新生事物。在正统社会理论中，它尚无一席之地。”美国学者琼·W. 斯科特在《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一文中如此阐述。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自我命题，性别“天问”一直为史学所虚化。“当然，某些正统社会理论建立在男女两性对立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些社会理论承认‘妇女问题’的存在，还有人提出了主观性别认同的概念，但是并没有指出性别是一种谈论社会或性别关系的方式。”^①这种“正统社会理论”性别思想，主要是指一种分类和表达方法，“或指男性，或指女性”^②，而且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当性别作为一种分析范畴进行解读性别规范定义的相关性内涵，尤其是两性互动中的社会意义密码，则无法在权威的百科全书和人文词典中找到它的解释，因为“历

① 琼·W.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66 页。

② 《法语词典》，1876 年版。

史学家们在研究政治、权力问题时，性别就沾不上边了”^①。

对于中国伶人研究而言，不但伶人是历史风尘中的失语者，长期被虚构了的史学边缘化，处于一种被阉割的性格气质之中，它的性别概念更是为经典史论所放逐，无法构成一种陈述状态，始终体现为非语言化和非本质化的他者地位。我们不禁发出诘问：伶人性别为何被边缘化？放逐政策又缘于如何的历史动机？伶人两性的规范和期望，到底存在一种什么形态？性别主体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机制如何？伶人社会性别以及它的表演关系规则是怎样运作的？这些颇具思辨性的性别疑问，其实都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意味。

二、社会性别概念

性别概念，首先应该区分“性（生来具有的分类）、性范畴（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和社会性别（社会成员资格的不断验证）之间的重要区别”。^② 性（Sex）是一个生物学的科学术语，它按照基因与性器官的不同将有机体分成雄性和雌性，或者特指性的行为。性范畴则是注意了性差异（Sex Differences）的人类学内容，运用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s）来表达它的内涵。社会性别（Gender）则是属于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的概念，形成了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它是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因为我们这个物种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有语言表达力的”，“文化的演变为提供了机会来抓住对性欲方式、生育方式和社会化方式的控制，以及作为清醒的决定将人类性的生活从使它畸形的古代关系中解放出来”^③，并

① 琼·W.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页。

② 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鲍晓兰译，王政校，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3页。

③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年刊于《走向妇女人类学》（Rayna Reri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一书。

形成了与此相关的自认性别、期待性别等一系列的社会化性别内容。性范畴是社会性别的初级阶段。

由此，性和社会性别构成一个巨大的演化地带，从生物概念的人形成社会概念的人，其间包含了丰富而又微妙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含义。“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秘书。脱离了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像金子本身并不是钱。”^①“这些关系”通过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而表现出来，使性发展成为社会性别，体现出与此相关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以及性别分层和性别不平等。“社会性别是多种关系体制和变量交织在一起形成的”^②，反映了复杂性和多变性的性别结构原则。

社会性别的非生物化表明了“我们认为是造成的‘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人造的，是由社会制度和把该社会制度解释为自然和生理决定的东西”，“性别的关系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③。人类学者米德（Margaret Mead）曾对新几内亚的三个部落考察后发现，两性关系秩序在不同部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曼德哥马（Mundugamor）族男人之间盛行换亲，用女人作交易，女性精力充沛却又厌恶生育和孩子，两性关系淡漠，冲突不断。可拉（Kola）族社会则女性管理着社会，妇女对待男人如同乳童一般，妇女从事集体劳动，男性却在打扮自己。阿拉帕什（Ara Pesh）族社会男女平等，女性具有母性、合作和不具有攻击性气质，两性关系相亲相爱。因此，米德断言：“每个民族文化都用一定方法使男女性别角色制

①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年刊于《走向妇女人类学》（Rayna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一书。

② 周颜玲：《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鲍晓兰译，王政校，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7页。

③ 琼·凯利-加多（Joan Kelly-Gadol）：《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标志》（Signs, 1: 4, 1976）。

度化，这种制度化不需要刻意描述两性人格的不同。”^①

“我们对‘社会性别’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把人们组织到男性和女性范畴里去的方式，以及围绕这些范畴产生出意义的方式。”^②这个“组织”过程，通过性和社会性别的互动“方式”完成，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形式，按照社会动机和规则，采用有形和无形的双重制度使性别社会化，生物形态的人被建构成社会意义的人，而且，永远表现为强制和自愿的叠加状态，固定为二元性质的男女两性结构；二是体现形式，“男性和女性范畴”生发出男女概念，并具有规范性和普泛性，“这些概念解释了象征的含义，限定了比喻的各种可能性。这些概念大多反映在宗教、教育、法律、科学和政治教义中，通常它们以固定的两极对立的形式出现，按部就班地描绘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含义。事实上，这些概念排斥了任何其他解释的可能性。所以，在历史的撰写中，这些规范化概念就成为社会认同的产物”^③。社会性别在这种组织和体现的性/社会性别制度中，形成性别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机制。

三、文化构造的社会角色

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性，体现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男性和女性必须接受的原则和社会规范”，“男性和女性的意义则因社会而异”。^④具体而言，一是社会性别作为文化建构，是以性别规范和社会角色作为基

① Margaret mead,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Mentor, 1950, p. ll.

② 费仪·金丝伯格、安娜·罗文哈普特·郑：《不确定的词语概念——美国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磋商较量》序言，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③ 琼·W.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66 页。

④ [日] 桥爪大三郎：《性爱论》，马黎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 页。

础的，“因为你是男的或女的，所以必须做什么”^①，“女人不该穿属于男人的衣物，男人也不该穿女人的袍子：那些这样做的人都是使主憎恨的”^②。“它是以一个人是男性或女性为前提，来划分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即特定的作用或行动。这种性别作用和性别规范，对于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难以逃避的”^③，并且把这一种生物差異性质扩大化和制度化，形成一种性别次序原则；二是这种性别次序，也即男女两性的政治、物质和文化等级关系，它的社会控制和运作过程是由男性操纵和维持的，男性处于一个主动和支配的地位，而且具有普遍和持久的制度性质，产生一种内在化的性别心理作用；三是社会性别存在着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在特定场景里通过社会的相互交往塑造而成的。一旦‘差异’在创造社会性别时建构起来，这种差异就被用来强化社会性别所谓的‘本质’，在社会性别行为中进一步表现出来，并合法化地作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④。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利用这种性别差异不断巩固和发展性别次序的不平等原则，并将性别次序原则同样转化成为一种制度。自然，“特定场景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对性别次序会产生一定的制度修正作用，“社会性别不是一个固定的、‘自然的’，而是一个容易变化的、尤其是通过磋商较量（Negotiation）而变化的范畴”^⑤；四是社会性别的差异性，表现为有形和无形的不平等形态，前者如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教化制度，后者如道德、伦理、宗教、审美的支持制度的价值与意义系统，都将直接影响性别制度、分工制度和包括生育、亲属、继承、庙祭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五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差异的可修正性，通过社会

① [日] 桥爪大三郎：《性爱论》，马黎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② 《圣经·申命记》：22：5。

③ [日] 桥爪大三郎：《性爱论》，马黎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④ 琼·W. 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序（Feminism and History, 1996）。

⑤ 费仪·金丝伯格、安娜·罗文哈普特·郑：《不确定的词语概念——美国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磋商较量》序言，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9页。

结构和个体能量的互动关系，“性客体化是妇女主体化的初级阶段，它将促使言行一致，将结构融于表达，将观念付诸实施，将神话寓于现实”^①，“没有对物的地位造反的女人以自己的状况宣告了自己作为人的失败”^②。女性的非他者化的争夺，将会调整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次序。

社会性别作为“人们获得个性并学习其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作用过程，它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必要环节”^③。在掌握生活技能和目标、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的成长中，以其中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为其核心部位，形成性别认同（Tender Identity），并演化为一种性别角色。它在个人认同自我生理性别的基础上，建立与社会性别同构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社会性别对男女性别角色构成了不同的期望、规范和行为，直接影响性别的公共概念和自我概念认同，形成相互对应的性别角色。它以一种信念和态度给两性确立一种标本和模范意义，构成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或称定型观念，产生一种框架和模板的作用。性别定型观念包括外表形象、人格特性、角色行为和职业。“性别角色和定型观念的跨文化研究表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对男女两性赋予不同的角色。但性别定型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似乎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一般来说，男性定型观念包括机械的（In—Strumental）或有能量的（Agentic）模式，而女性则是富有表达的（Expressive）或公共性的（Communal）模式。”^④

因此，作为个体而论，每一个男性和女性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格规定性，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男性和女性又都分别具有共性。“男性特征（Masculinity）和女性特征（Femininity）是对于男子和妇女的群体特征（共性）的极端的表述，两者构成、并且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例

① 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语，引自费仪·金丝伯格、安娜·罗文哈普特·郑《不确定的词语概念——美国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磋商较量》序言，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夏洛蒂·伍尔芙（Charlott Wolff, 1971）：p. 65。

③ 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38页。

④ 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如，前者往往与公共领域、积极的、理性的、果断的、暴力、独立、支配和统治等特性相联系，后者则常与私人领域、消极的、重情感的、优柔寡断的、和平、依赖、被支配和被统治等特性相联系。”^①这种“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便是社会性别认同的结果，构成了一种社会性别角色。这里，“男性特征”取得了主动权，而“女性特征”则走向被动，性别的社会化使男女两性气质产生差异，男性承担积极的工具性角色（the Instrumental Role），妇女承担社会的情感性角色（Socioemotional Role），而且“性别角色成为人类行为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心理学家在经验研究伊始便发现了性别差异”^②。性别角色认同并在再社会化和终身社会化中，强化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对垒或者妥协关系。

正是缘于此，“我们不得不做女人，或不得不做男人”，而且“对男人，它要求压抑那部分当地认为‘女性化’的特点；对女人，它要求压抑那部分当地界定为‘男性化’的特点。两性的区分的后果是压抑那些实际上每个人——包括男人女人——都有的性格特点”。由此，“排他的社会性别认同远非自然差异的一种表现，而是对自然相似之处的压制”，^③“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别是强加于某一男性或女性身上的一个社会范畴”，“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④“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它是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⑤。社会性别角色也就形成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即男性/女性、“男性特征” / “女性特征”，并由此从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中

^① 李英桃：《“男性”国家和“女性”国际社会——一个社会性别视角》，《中国女性文化》（No. 2），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 页。

^② David McClelland, Power: The Inner Experience , New York: Irvington, 1975.

^③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 年刊于《走向妇女人类学》（Rayna Ri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一书。

^④ 琼·W.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56 页。

^⑤ 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 年刊于《走向妇女人类学》（Rayna Ri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一书。

分离产生一种社会性的隐喻，它的核心部位形成了统治/被统治、支配/被支配的性别等级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实质是社会和性别的一种合谋，以使男女两性成为一种“社会动物”，构成一种性别次序关系。这种合谋过程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性别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

第二节 伶人的特殊性别和角色

一、两性的较量关系

中国原始性别关系经历了乱婚、群婚和对偶婚几个阶段，已经萌发了两性的最早观念，这在道家的阴阳学说中有着较为完整的性别阐释。

宇宙混沌初开，出现天地与乾坤的二元结构，而天地之“道”则由“阴”与“阳”所构成。一切现象均由此生发而来，男和女的关系也是如此。《周易·系词传下》云：“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词传上》也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两性象征道的和谐，而且并不存在性别歧视或者性别次序关系。“男性狩猎、建筑、制陶，女性侧重纺绩、制衣、饮爨、生育等，但没有主次、高低之分。相反，女性的生育还受到相当的尊重，这从当时盛行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生殖崇拜仪式和神话中对‘女娲造人’的歌颂都能表现出来。墓葬也反映了当时以母系为中心的葬俗。”^① 有种观点甚至认

^① 杜芳琴：《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个人的经验》，《中国女性文化》（No. 2），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为，“这种生产生活以母系为纽带维系的社会组织中，男女作为氏族成员是一律‘平等’的。换句话说，当时尊女崇母而不歧视男”^①。

人类阴阳性别之中开始注入与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和控制欲望相关的概念，在两性之间也就出现性别分层，男女和谐产生倾斜。颇有意味的是，最初受到性别轻视的是男性，“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殷道亲亲”，是为重视母统。商朝《归藏》又名《坤乾》，也阐述了首坤次乾的概念，显示了母系社会的女性性别身份。这种重母统的体制在一些原始部落仍有历史的性别遗存，“男子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为之夫着，终月抱子而游，无子则袖手安居”。^②“妇人多智，夫听于妻”，“生女则喜，男则忧，男则娶于人，妇则娶人”，“盖女贵于男”。^③只有到了父系制度建立以后，阶级逐渐形成，乾坤阴阳发生颠倒，以维护和巩固新的社会秩序。

不过，从母系社会到父系制度经历了一个微妙的两性较量过程，从而争夺对性别关系的主导权，其中“不落父家”和“产翁制”即显著地表明了这种性别裂变。前者从“从妻居”到“从父居”，男性要求建立新的性别关系，而原先的两性规范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范畴，形成了“不落父家”的习俗，即女性出嫁后并不立即居住夫家，而是回到娘家，待有孕方到夫家落户，“娶日，其女即返回家，与邻女作处。闲与其夫野合，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始称为妇也”^④。“‘不落父家’习俗反映了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男子要求归属自己的强制和女子对这种独占的反抗，结果，从夫居的习惯逐渐被固定下来，新一代的男女们与传统的母系氏族的理想联系被削弱。”^⑤后者的“产翁制”，男性为了争夺性别的主动权，确

^① 杜芳琴：《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个人的经验》，《中国女性文化》（No. 2），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②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③ （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④ （明）邝露：《赤雅》。

^⑤ 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